

李弘祺

宋代教育散論

李弘祺 著

宋代教育散論

東昇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① 刊專人學昇東

宋代教育散論

著者：李

弘

祺

出版者：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二三三號

發行所：東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龍泉街卅七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五二一五一

電話：三九一四九七九・三九二六一〇六

定價精裝新台幣 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

紀 念

先父 李嘉嵩教授（一九一四—一九七八）

母親 李施瓊花女士

畢生從事教育事業

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飾，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作者簡介

李弘祺：台灣大學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耶魯客座助理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講師。專攻宋代教育史及近代西洋史學史。編有「歷史上的封建制度」（與王任光教授合編，學生書局出版）及「史學論文選輯」、「思與言論文選」（將由食貨月刊出版）。文章散見港台學報、雜誌、日報等；英文論文發表於「亞洲學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及「宋史通訊」（Sung Studies News Letter）等刊物。

自序

本書所收集七篇有關宋代教育的文章都是我近數年所寫的，有的已發表，有的此次第一次發表。它們都是不成熟的作品，只能代表我學術生命的一個小階段。

研究宋代教育不覺已七年了，時間不謂不短，但歷史材料浩如淵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宋人的作品即有三千多種，任何學者窮畢生之力也無法把這些材料看完，更何況還有其他千萬種宋人所著或有關宋史的著作！學海無窮，莫此為甚。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不研究歷史。宋代教育史更不可不仔細研究，因為宋代教育的成就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太大了！宋代是中國考試制度發達完成的時代。明清考試制度的根本始自宋代，而考試制度成為中國社會最重要的上升途徑也奠基於宋朝。即使到科舉罷廢的廿世紀，讀書人的理想，考選思想的根深蒂固無不反映考試制度在中國歷史及社會的深厚影響。要

瞭解現代中國社會的結構，教育及考選的理想，我們都不能不對宋代教育有初步的認識。

宋代是中國書院制度興起的時代。書院教育的理想對中國人的教育的影響盡人皆知，用不著我在這裡贅敘。卅年前從中國逃難在香港的一些學者，集資設立新亞書院，在萬般艱辛的環境中，不辭勞苦。卅年下來，成績輝煌。從這一件簡單的事例我們就可以看出書院理想在今日的港臺仍維繫不斷。踵事此理想的人當不能忘記鵝湖的講學，東林的風雨書聲，萬木草堂的興奮。要瞭解這種精神，我們不可以不回到宋儒冒偽學之不諱，艱辛創立書院的決心和勇氣。

宋朝又是中國印刷術第一次普及的時代。印刷術的影響不待言而知。到了今天，雖然電影電視逐日普遍，而代表線形視野的書籍仍然是決定我們思考及意見的最根本的方式。要瞭解文化傳遞或傳播的過程，那麼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回到宋代去，在那素樸的印刷術傳播活動中，我們也許可以找到許多值資參考的模式或借鏡。

宋代教育史和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的變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可以說中國教育史上的地方學校制度是由變法的改革家們所締造出來的。王安石、章惇及蔡京的太學及地方三舍法日後對中國教育有十分深刻的影響，簡直是開教育及科舉合併之先河。要徹底瞭解中國的地方教育系統，我們一樣必須回到宋代去。

本書既然只是近數年作品的叢刊，自然無法把宋代教育的全貌作任何有系統的交待。我只在本書之第一篇文章（宋代教育史研究的幾個方向）提出我對方法論的一些看法。但是我在本書中至少想提出兩個粗淺的解釋。第一個是有關考試制度和中國社會結構的關係。在我看來，考試制

度是用來維繫中國政府控制思想及政治活動的有效工具。它越「公正」就越有效。過去許多學者認為考試制度因為十分公正，便認為它具有促進社會上升機會的功能。我個人認為這個解釋是偏頗了，並沒有把握到考試制度的根本作用。在「公正、平等與開放」一文中，我把這個解釋作了理論上的交待。

第二個解釋與蔡京的教育改革有關。過去解釋蔡京變法之失敗都是從道德的立場著眼。這個我並不反對。但就教育改革一節言之，我認為我們還可以更具體地從當時的社會條件來處理這個問題。在「北宋教育與科學的幾個問題」中，我認為蔡京大規模發展地方學校教育的努力最後所以失敗是由於當時的社會是一個單線社會上升的社會，而上升的機會十分有限，無法收容過多的受道德或經學教育的人，因此學校雖大量建設，願意就學的人卻無法相應增加，於是教育改革因此失敗了，而從范仲淹，王安石到蔡京，朱熹一脈相承用教育取代考選的理想也跟著無法付諸實現。

從這兩個論點，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或想像宋代教育的其他特徵。我在這裡不能詳細交待我對宋代教育的全盤看法，但是至少可以簡單作一個概括性的討論。我認為中國教育的特不只在於培養所謂的知識份子，好在面對專制君王的反智政策時，提出諫爭，抗議或批評。它更在於培養一般的平民，在封閉，一元化，近乎黑暗的社會中，找尋精神及心靈的昇華，以求自得。這兩方面的教育功能基本上是相聯貫的，它們都肯定既有封閉，專制的結構，認為至少為了維持政治及社會的安定，不可以輕易加以動搖。但是在結構，意理及教條的層層枷鎖中，在面對「無可逃

於天地之間」的莫可奈何境況之下，受教育的人却並不可以因邪喪失他的真誠和良心，或至少必須在這個昏黑的外在條件的束縛下，從自我的解放裡頭，追求內在的心安理得。這種教育下的產物當然是被動的，是內省的，但是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却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

這樣的教育代表一種傳統的價值取向，用現代社會學家 David Riesman 的說法是「傳統取向」的 (tradition oriented)，而與儒家的教育理論相通，肯定人自我的道德自主性。它的好壞端在於它在傳統社會及政治條件下的有效性。毫無疑問的，它是有效的，因此是好的。當然在廿世紀的社會裡頭，我們是否仍然應該認為教育的目的僅在於道德自我的建立，或者是希望在教育過程中，灌輸價值的多元，以及強調制度的非絕對性，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研究教育史的吊詭 (paradox)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瞭解，而因此可以超越。

幾年來我研究宋代教育史無時不是抱著上面所說的態度。但是理想或目的絕對不可以左右方法。有人說歷史沒有方法。此說我基本上贊成。嚴格言之，方法是從摸索材料中訓練出來的，因此史學方法就是史學史。不過，研究歷史也不是完全沒有方法上的假設，尤其在概括 (generalize) 很多的材料時，對於社會科學的方法必須有一些基本的認識。例如在統計一大堆數目時，統計的人應該對於統計學中的標準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有所瞭解，以免在求得平均值的過程中產生差誤。相同地，何時採用算術平均，何時採用幾何平均，學習歷史的人也應該有一些

基本的常識。換言之，研究歷史，爲求其準確，學者要重視方法的訓練。方法嚴謹，其結果往往與傳統的解釋發生差距，於是許多忠實於傳統方法或解釋的史家便排斥新的方法。這個態度是不應該的。正確的方法是破除迷信的利器。在「北宋國子監與太學的經費」一文中，我嚐試超越簡單的敘述，而利用經濟史材料來測量國子監與太學經費的數目，以決定經費是否寬裕。在文中，爲求得米價（作爲物價指數）的趨勢，我使用了比較可靠的幾何平均，這是代表方法上求準確的努力。成績雖然有限，但至少我希望讀者可以領會方法學的重要性。

本書另外收有「宋朝教育與科學散論」。這是一篇書評，同時簡略處理宋代太學的兩個小問題：太學與國子監的關係，南宋太學的補試方法。「宋神宗朝太學發展的兩個階段」處理王安石的太學政策，並指出真正全力推行太學三舍的是張璪，李定等人。這兩篇文章所處理的可以說都是很細的題目。但是作歷史研究正就是必須從這種最基本的研究累積起來。

最後一篇「評介『宋代書錄』」與教育史沒有直接的關係。它是一篇書評論文，收於本書讓讀者對於國際間的宋史研究有一個粗淺的認識。

本書所收論文寫成的時間達五年之久，用過耶魯大學，哈佛燕京社，香港中文大學，史坦福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圖書館，部份文章亦曾由中文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向哈佛燕京學社爭取得輔助，茲一併在此向上述機構道謝。部份文章又曾在「思與言」，「中國時報」，「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及「食貨月刊」發表過，現在蒙他們允許發

表，也在這裡向他們道謝。

同時，內子陳享女士的功勞，我應該在此一併提到。本書寫作期間，數度遷徙，往返港、美之間。內子之辛苦不可言喻。書成之日，念寒暑歲月，益愛感激內助之功。

最後，我謹向黃俊傑先生致謝，本書都是他代為聯絡安排，始得由東昇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李 弘 祺

一九七九年感恩節於史坦福旅次

目錄

自序·····	一
宋代教育史研究的幾個方向·····	一
公正、平等與開放·····	二三
宋代教育與科舉的幾個問題·····	三五
北宋國子監與太學的經費·····	七三
宋朝教育及科舉散論·····	九七
宋神宗朝太學政策的兩個階段·····	一二九
附錄	
評介「宋代書錄」·····	一五九

宋代教育史研究的幾個方向

研究教育史的人過去都是學教育的人，他們所具備史學的知識和方法論的訓練都比較有限，無法清楚地把歷史背景作清楚的交代，學習歷史的人因此有特別的責任，用歷史的眼光處理教育史上的大問題。

傳統治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多總是從正史裏頭的選舉志入手，專門重視中國政府選拔文官的方式。嚴格言之，這只是教育的一小部門，但是如果從中國社會的特質看來，研究科舉養士的方法究竟不失是一個大題目，因此過去談中國教育史的人都集中於研究科舉的制度，而附帶說明官立學校的運作，如是而已。

治宋代教育史大概也會遇到這些相同的問題。中外作品中單獨成書研究宋代教育的歷史的並不很多^①。假如現在要研究宋代教育，可以說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可以用的書作爲出發點。研究

^①就我所知僅有日人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東京：博文社，一九六五）。有關此書之書評請參看我的「宋朝教育及科舉散論」，收於本書頁九七至一二八。

者恐怕一定要先從宋史選舉志及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學校考」入手。本來宋史和文獻通考都不是材料集，都是具有一定史觀，經過選擇排比而成的史著，因此視之爲第二手史料並無不可。根據這兩本著作寫成的教育史，它一定集中闡述政府的各種官學組織及系統，考試制度的運作方式及科目，以及頂多一些關於專門學校的組織及教學內容，如此而已。

任何受過一點近代教育學說薰陶的人都會覺得談教育而光談制度是不够的。事實上第一本現代人寫的中國教育史，它就連帶談論教育理論。這本書是日本人狩野良知所寫的「支那教學史略」，晚清時以中文寫成，並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②。狩野寫這本書時或許曾經受過當時在日本有很大影響的教育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啓發。不管如何，狩野氏曾經把宋元學案的一些材料放在他的書中，作爲討論宋代教育的一些根據。

由此可見，研究教育史的人大致也會應用宋元學案所陳述的宋代思想界的內容和分野作爲討論宋代教育理論的根據。

狩野良知的書既然是近代第一本討論中國教育的書，那麼我們就有必要稍爲注意一下它的內容和解釋。首先，這本書的觀點和收集材料的方式可以說是十分的傳統，不出上述宋史、通考及學案的範圍，並且大致照抄原文，因此其解釋也十分保守，沒有什麼突破，例如談王安石的地方，他只這麼說^③：

②狩野良知：支那教學史略，中文本於一九〇三年於上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③同上註，卷三，頁四五五。

宋代學者位至宰輔者王安石、司馬光。而王安石執拗自用，變法病民，反被王道以自文，又以欺世，終亂宋國。若其新經義，亦成於其子雱等之力，一家之私說，固不足道也。

像這樣的觀點，恐怕只有在當時還可以被接受吧！等到梁啟超的王荊公出版之後^④，一般人對王安石的評價就有了改變了。

狩野的書出版之後，中國人用中文寫作的教育史的書相繼出現^⑤。依我的看法，則早期以陳青之和陳東原的最值得參考。晚期，以余書麟的最詳瞻。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就在狩野良知的書寫成的時候，有兩本十分重要的史料正開始受人注意。這兩本書就是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以及宋會要。兩本材料集都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宋」字下輯編而成的，但是四庫全書編成之後，兩書的流傳都不廣泛，因此治宋史的人並不太能用到它。到了一八八二年，李燾的長編才由浙江書局刻版發行。這在宋史研究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宋會要則在清末流傳於藏書家中，直

④ 梁啟超：王荊公（上海，廣智，一九〇八），後收入其中國六大政治家。

⑤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一九三六），此書在臺灣由商務再版。

余東蓀：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一九三六）。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大綱（上海，中華，一九三六）。

王氏兩書並不重複，且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比較兩書一定會有許多有趣的發現。另外還有：

蔡元培：中國學制史（上海，世界，一九三三）。

郭東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上海，商務，一九三三）。

余書麟：中國教育史（臺北：師範大學，一九六〇）。

到一九三六年才由北平圖書館收齊，纂成「輯稿」，影印發行^⑥。這兩本材料集出版之後，宋代史的資料可以說突然大為增加。我們雖不能說兩書可以改變我們對宋代史的見解，但若說它們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大小不等的問題，那就一點也不為過。

史料的範圍大為擴展，而史學解釋的發展也日進有功。因此我們應該可以期待這期間有關中國教育史新著會有重大的突破。坦白言之，在解釋上有一些新見解的固然有，而能使用新材料的却並不多。這當然是因為「中國教育史」一類的書本身是集別人研究成果而寫就，不能強求作者本身去作第一手的原始研究，因此在沒有新的研究論文專著出版之前，這些通論性質的書免不了顯得十分陳舊，缺乏新意。

但在解釋方面，我倒很想特別提出陳東原的「中國教育史」這本著作。他不像別的作家只會附會新說，搬弄一些新名詞^⑦，沒有絲毫自己的創見，相反地，他提出了「養士教育」的觀念，認為這是中國教育史的最根本特色。這一點卑之雖無高論，却能對中國傳統教育觀作出妥切的描述。

雖然如此，陳東原大概是由胡適而間接受到杜威的影響，也注重一些傳統中國人不注意的教育現象。在論宋代教育的一段，陳氏特別開了一章，題為「宋元之實際教育」。裏頭講到的是小學的組織，啓蒙書的內容以及理學家的分年課程，洒掃應對的教育方式。陳氏注意到所謂的「實

⑥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平：北平圖書館影印，一九三六）。

⑦ 例如陳育之的書集用馬克思的歷史分期法。

際教育」可以說是個十分重要的突破。很顯然地，他所關心的「教育」已超過「養士教育」了。

爲了寫「宋元之實際教育」，陳東原不能不超越傳統的材料，搜集筆記及文集中的記載。這樣子，在無形中，因爲對「教育」的看法有了改變，對材料搜集及處理的方法因此也跟着不同。但是陳東原還是沒有應用長編及宋會要的資料。

一直要到一九五〇年代，通論性的作品才大量援引了宋會要及長編的材料。這一時期的書主要有三本值得我們注意。這三本就是王建秋的「宋代太學與太學生」，日人荒木敏一的「宋代科舉制度研究」以及寺田剛的「宋代教育史概說」。一般地說，這三本書都已經把最新的史料編纂進去了^⑧。

研究宋代教育史到了這個階段可以說已經有一定的成績。如果沒有新的材料出現，我們對宋代教育制度的輪廓可以說已經不能再有突破性的新見。頂多只是一些枝節性的修正而已。

以上所討論的集中於官學及科舉制度。但是宋代教育的另一個特點是書院的興起。本來書院早期的發展與官學無涉，因此材料比較零散，並不集中，研究起來也比較困難。後來地方三舍推行，地方學校逐漸納入考試制度之內，真正的教育落在書院的肩膀上，於是政府就開始管制書院，使之「官學化」^⑨。官學化後的書院材料就漸漸在正式史著，例如續文獻通考等出現。現在研

⑧ 見本書97—128頁。

⑨ 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313—317頁。